

## 經歷的風雨

照片	文字說明
	<p>被拆毀的海珠炮台，1858 年。 布蘭傑攝</p> <p>在廣州城南離岸不遠的珠江中有一塊突出水面的礁石，稱海珠石，清順治四年(1647)在其上修築炮台。第一次鴉片戰爭中這座炮台受損，雖很快重建，但 1858 年英法聯軍佔領廣州後又拆毀了這座炮台，即照片中的情景，直至 1888 年才再次重建。</p> <p>進入民國後，這裡一直為軍警辦公之所，1920 年代改為公園。其後廣州於 1931 年擴築新堤，海珠石由此成為現今廣州沿江路的一部分。</p> <p>(參考編號：GC14.S.13)</p>
	<p>被英軍抓獲的兩廣總督葉名琛，1858 年。</p> <p>英、法兩國分別於 1842 年及 1844 年通過逼使清政府與其簽訂不平等的《南京條約》及《黃埔條約》，而在中國取得各種權益。但兩國不滿足於此，其後仍想擴大其在華的權益而欲修約，為清政府拒絕，於是兩國以不同的藉口挑起第二次鴉片戰爭。</p> <p>英法聯軍在 1857 年進攻廣州，當時處於戰爭最前線的地方官——兩廣總督葉名琛既沒有組織有效的軍事防禦，也沒有進行有效的軍事進攻，並採取「不戰、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的態度，更誤判當時的形勢，最後導致廣州於 1857 年底失守。</p> <p>1858 年，英軍將抓獲的葉名琛送至印度軟禁，相片所示為已被抓獲的葉名琛。這期間他拒絕吃英國人提供的食物，在吃完自帶的食物後，於 1859 年絕食而死。</p> <p>(參考編號：1072-PAG107.S.1)</p>



柏貴與巴夏禮會談，1859 年。

羅西耶攝

英法聯軍佔領廣州後，清政府罷免了葉名琛的兩廣總督職位，由原廣東巡撫柏貴署任。看似清政府仍然維持了對廣州的管轄，但實際上柏貴每一條政令的發佈都受到以英國駐廣州領事巴夏禮為首的三人委員會審查，以柏貴為首的廣州衙門成為受聯軍控制的傀儡政權。照片中是正在交談的柏貴(左)與巴夏禮(右)。

(參考編號：SC7.38)



香港維多利亞港，1860 年。

比托攝

相片為英軍隨軍攝影師比托於 1860 年在香港停留，等待北上時攝。相片可見海港內滿佈戰船，為英法聯軍向中國發動新一輪攻勢作準備。

(參考編號：AC1.34)



大沽南炮台向北望全景，1860 年。

比托攝

第二次鴉片戰爭時，清軍與英法聯軍於 1858 年、1859 年及 1860 年在大沽口進行了三次大戰，清軍只於第二次戰役中獲勝。

清軍在 1858 年第一次大沽口戰役失利後，由主持海防的欽差大臣僧格林沁對大沽口的佈防進行了重新安排，不僅修復了之前受損的炮台，還增設了新炮台。從這張照片就能看出清軍在河口中阻攔登陸的佈置：尖樁、壕溝、樹枝間隔排列。

(參考編號：AC1.13)



被英軍用作指揮部的北塘炮台，1860年。  
比托攝

雖然在 1860 年 8 月第三次大沽口戰役之前清軍加強了防守，但卻將其北邊北塘炮台的守軍撤走，導致英法聯軍從背面擊破了清軍的陣地。英軍佔領北塘炮台後，將其置為臨時指揮所，從照片中丟棄的輜重裝備看得出這次清兵撤離非常匆忙。

(參考編號：AC1.1)



被佔領的大沽北炮台內部，1860年。  
比托攝

大沽北炮台剛淪陷於聯軍之手，攝影師比托就去現場拍攝了照片。彼時戰場尚未清理，地上滿佈的清軍屍體展現了當時戰鬥的慘烈。從散落的清軍武器來看，抬槍、弩、腰刀等都很難成為英法聯軍當時裝備的燧發槍的對手。但儘管在武器和戰術上清軍居下風，這些守台官兵還是戰鬥到最後一刻。

(參考編號：AC1.8)



被佔領的大沽北炮台外部，1860年。  
比托攝

從照片顯示，清軍在炮台外圍的防禦組合是深壕和尖樁，在戰術上這是為了拖緩敵人前進的速度，但最終聯軍還是突破到了炮台下，並通過雲梯進入了炮台內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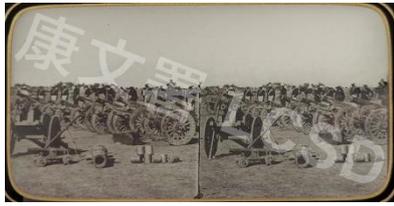
(參考編號：AC1.5)



調頭的大炮，1860年。  
比托攝

經過八里橋戰役之後，清軍的精銳部隊已折損殆盡，英法聯軍一路抵達北京都沒有受到阻攔。在兵臨北京之前，咸豐皇帝等人離開北京，往熱河「北狩」，留下恭親王奕訢負責與聯軍交涉。英法聯軍劫掠並燒毀了圓明園，佔領了北京城，並調轉城牆上大炮的炮口指向城內，正如相片所示那樣。

(參考編號：AC1.17)



法軍繳獲的清軍大炮，1860 年。

杜賓攝

清軍從北塘炮台撤走，匆忙間留下了大量輜重。從這張照片可以看出法軍在北塘炮台繳獲了很多清軍火炮。

此相片為法國軍隊的杜賓上校所拍。他於第二次鴉片戰爭隨軍隊來華時，在上海、煙台、天津、通州和北京都拍了立體照片。杜賓也參與了英法聯軍對圓明園的掠奪。

(參考編號：SC4.4)



北京的高廟，1860 年代。

摩爾攝

高廟是北京普濟寺的俗稱。這座小廟因為在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曾軟禁過巴夏禮而被歷史記載。會說中文的巴夏禮於 1860 年 9 月代表英法聯軍去通州談判，被清軍抓獲，清軍希望能通過他逼使聯軍退兵，將其關進大牢。當聯軍逼近北京時，巴夏禮被送至高廟休養，恭親王奕訢希望他寫信給英軍講和撤兵。巴夏禮最終在 1860 年 10 月 8 日被釋放，幾天後聯軍攻入北京。

(參考編號：AC7.A.31)



圓明園大水法遺蹟，1870 年代。

第二次鴉片戰爭時，英法聯軍在圓明園內大肆搶掠並焚燒此皇家園林，使其變成廢墟。此為圓明園的大水法遺蹟。

圓明園西洋樓的最大特色是水法，即噴泉，其中規模最大的噴泉就是照片中位於遠瀛觀前的大水法。在背景中石門的前面，原有一座大型的獅頭注水口，向下形成七層水簾。最下方是海棠形噴水池，池中心有一隻銅梅花鹿，有八道水柱從鹿角噴出；周圍有十隻銅獵狗，口中噴出的水柱直射鹿身，俗稱「獵狗逐鹿」。如今這裡僅餘的幾根石柱被作為圓明園的標誌圖案。

(參考編號：GC34.S.10)



圓明園西洋樓養雀籠，1870 年代。

查爾德攝

顧名思義，養雀籠是飼養飛禽的地方。在照片所示的門洞後兩側原有銅網編織的巨大籠子，飼養著各地進貢的珍禽。這座建築的形制中西合璧，其西立面是中式柱廊的樣子，而東立面則是有個石龕的西式門洞，如今只能通過地基的石塊才能看出來這裡曾經有一座建築。

(參考編號：AC56.33)



圓明園諧奇趣，1877 年。

查爾德攝

圓明園諧奇趣是西洋樓園區內第一座完成的水法建築。主樓的南面原有一座面積很大的海棠形噴水池，池內設有銅羊、銅鴨和翻尾石魚等組成的噴泉。主樓兩端有弧形的長廊分別連接一座兩層的建築，用作樂隊演奏時的場地。

(參考編號：1113-PEK27.S.1)



圓明園遠瀛觀殘蹟，1870 年代。

查爾德攝

據說遠瀛觀曾被乾隆皇帝指定給他寵愛的容妃居住，為她配備了西式的金屬床和浴缸，以及西洋玩具和裝飾品。門窗的玻璃上繪有西洋人物及風景畫。不過這一切在 1860 年英法聯軍施放的大火後都不復存在了，如今只剩下幾根石柱孤零零地立在那裡。

(參考編號：AC56.34)



圓明園方外觀殘蹟，1870 年代。

摩爾攝

據說方外觀是為乾隆皇帝寵愛的容妃作禮拜而建。從這張照片可見圓明園被英法聯軍劫掠焚燒後十餘年，建築的主體基本完好，甚至屋頂也基本完整。但此後數十年不斷的拆毀於今天只剩下地基，比如觀前的這座石橋後來便被移往北京大學未名湖。

(參考編號：GC22.S.15)



圓明園廓然大公，1879 年。  
香港華芳照相館

廓然大公是極少數在 1860 年英法聯軍施放的大火中倖存下來的圓明園中式建築群。相比西洋樓，磚木結構的廓然大公能保存下來簡直就是奇蹟。遺憾的是在日後不斷的破壞中，除了假山的遺蹟外，廓然大公已經看不出什麼影子了。

(參考編號：AC9.A.25)



俯瞰九龍半島，1870 年代。  
香港華芳照相館

1842 年清廷被迫簽訂不平等的《南京條約》，英國割佔了香港島，1860 年清廷在第二次鴉片戰爭再次戰敗，又被迫與英國簽訂另一不平等的《北京條約》，英國割佔了九龍界限街以南。從這張由香港島拍攝的照片可見當年九龍的建築物還是非常的疏落。

(參考編號：P.22)



慈禧太后，1903-1904 年。  
勛齡攝

慈禧太后在 1903 至 1904 年之間由勛齡拍攝了 70 多張照片，大都保存在北京故宮博物院。勛齡的父親曾任清駐法公使，勛齡在法國接受教育。

勛齡的妹妹是當時擔任慈禧太后御前女官的德齡，她後來將部分慈禧太后照片的底片帶到了美國，最終入藏弗利爾美術館。因此除了當年賞賜給外國使臣的照片，收藏市場上幾乎沒有直接由底片洗印的版本流通。

(參考編號：GC18.P.1)



恭親王奕訢，1860 年。

比托攝

1860 年英法聯軍兵臨北京時，咸豐皇帝離京往熱河「北狩」，命自己的異母弟恭親王奕訢坐鎮北京主持和英法聯軍的交涉。

奕訢代表清政府於 1860 年 10 月 24 日與英國簽署不平等的《北京條約》，中國喪失更多權益。11 月 2 日，奕訢回訪英國統帥額爾金，英國隨軍攝影師比托抓住機會為他拍攝了兩張肖像，此為其一。當年奕訢 27 歲。

奕訢其後主持新開設的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和軍機處，成為中國內政外交的重要人物。

(參考編號：AC1.31)



醇親王奕譞，1880 年代。

梁時泰攝

醇親王奕譞是咸豐皇帝的異母弟。他的哥哥恭親王原主持軍機處，在中法戰爭失利後，被慈禧太后斥退，於是奕譞被推到前台，開始執掌國家軍政大權。

1885 年，奕譞主持了新成立的總理海軍事務衙門，為推動北洋水師的成軍做出了貢獻。同治皇帝逝世後，奕譞子載湉被指定繼承大統，即光緒皇帝；光緒皇帝逝世後，奕譞的孫子溥儀又被指定為皇帝，即宣統帝，奕譞的後人中先後出了兩位皇帝。

(參考編號：AC9.A.40)



慶親王奕劻，1900 年。  
利卡爾頓攝

奕劻是不入八分輔國公愛新覺羅·綿性長子。他在醇親王奕譞和恭親王奕訢相繼離世後成為掌管外交、軍事的重臣，集內外大權於一身，並參與了不平等的《辛丑條約》談判等中國近代史上的重要事件。

(參考編號：1016.1)



李鴻章，1870 年代。

李鴻章是中國近代史上最重要的政治人物之一，他從編練淮軍與太平軍作戰起家，到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一路上幾乎參與了中國近代史上所有的外交事件，還一手打造了曾經位列亞洲第一海軍的北洋水師，推動開辦了中國近代的第一家銀行，第一座現代化兵工廠等等。

(參考編號：AC8.A.46)



恭親王奕訢，1871 年。  
湯姆遜攝

在第二次鴉片戰爭時，恭親王奕訢代表清政府與英法聯軍談判及簽訂不平等的《北京條約》。受此重創後，奕訢極力主張中國要自強，成為洋務運動的重要推手。在他的支持下，清政府創辦了第一批近代軍事工廠，編練了第一支近代陸軍，開辦了第一所訓練外語人才的近代學校，派遣了第一個官員出洋考察團，以及第一個外交使團等。拍攝此照時，恭親王為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主理人，此為推動洋務運動的重要機構。

(參考編號：AC10.1)



總理衙門牌樓，1870 年代。

查爾德攝

在經歷了第二次鴉片戰爭的失利後，清政府為解決各種棘手的外交問題而成立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雖然這個部門建立的初衷是為了解決與外交有關的問題，但在後來的運作中實際扮演了推動清政府進行洋務運動，使中國逐漸與世界靠攏的角色。總理衙門設在北京的東堂子胡同，照片中是其第一進院內的牌樓，上題出自《漢書》的「中外禔福」四字，取國內外一片安寧祥和之意。

(參考編號：AC56.22)



斌椿考察團主要成員合影，1866 年。

巴黎巴雅德和博濤照相館

1866 年，擔任大清海關總稅務司的英國人赫德準備回國休假，他向恭親王奕訢建議可以帶一名清廷代表前往歐洲遊歷，記錄見聞。總理衙門同意了這一計劃，由赫德的中文秘書斌椿帶隊，並選帶同文館的英文學生德明和鳳儀，以及法文館的彥慧，其他成員還有斌椿的兒子廣英。

考察團於 1866 年 3 月出發，8 月回國，遊歷了十幾個歐洲國家，期間還拜訪了英國維多利亞女皇及瑞典國王等。這是團員在法國巴黎的合影，前排左起為鳳儀、廣英、斌椿、德明、彥慧，後排為大清海關的外籍人員，左起為德善、包臘和美理登。此行是清政府首次派員出洋考察。

(參考編號：1006-PAG47.S.1)



蒲安臣使團主要成員合影，1868 年。  
布萊迪攝

相片所示為清政府向西方派遣的第一個外交使團，由當時剛卸任的美國駐華公使蒲安臣(前排中)率領，成員有總理衙門章京孫家穀(前排左一)和志剛(前排左三)、法籍海關稅務人員德善(後排左一)、英國駐華使館翻譯柏卓安(後排左二)。

使團於 1868 年 2 月出發，1870 年 10 月回國，訪問了共 11 個歐美國家，期間拜訪了英國維多利亞女皇、法皇拿破崙三世、普魯士國王威廉一世等。使團除相片所示的人員外，還包括了同文館的學生等。

蒲安臣於 1870 年 2 月停留俄羅斯期間病故，使團改由志剛率領。這是清政府向外派遣的第一個外交使團，標誌著清政府向國際社會及西方式外交踏出了第一步。

(參考編號：220-CC.S.40.1)



第一批留美幼童合影，1872 年。

1854 年在美國耶魯大學畢業的容闈建議清政府選派幼童去美國留學，這一建議得到曾國藩和李鴻章的支持。經過選拔，從 1872 至 1875 年，先後有四批共 120 名幼童被送往美國學習，他們平均年齡約 12、13 歲，七成是廣東籍，其中很多人回國後成為外交、教育、海軍、礦業、鐵路等方面的人才。鐵路專家詹天佑、外交官梁敦彥也是第一批留美幼童，那時他們分別為 12 及 15 歲。

(參考編號：989-PAG30.S.1)



戈鯤化，1879 年。

1879 年，在大清海關任職的美國人杜德維建議哈佛大學聘請在英國駐寧波領事館內擔任翻譯和中文教師的戈鯤化作該校的中文教師。戈鯤化擅於作詩，因此他在哈佛大學開設的課程也是圍繞著中國的詩歌，還專門編制了一本中文教材《華質英文》。不幸的是他在美國執教兩年多後感染肺炎病故。以戈鯤化捐贈給哈佛大學的藏書為基礎，逐漸發展為美國的漢學研究重鎮燕京圖書館。

(參考編號：199-CC.S.1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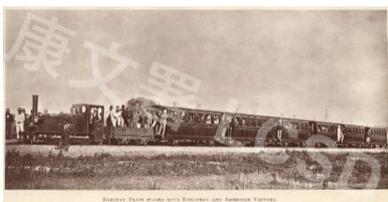


南京金陵機器製造局的工廠，1871 年。

湯姆遜攝

清政府在 1861 年至 1890 年代推行洋務運動，希望借西法以自強，而現代武器的生產是重中之重。李鴻章在組織淮軍與太平軍戰鬥期間就深深感受到西式武器的威力，因此他在 1862 年於上海籌建了「上海洋炮局」，主要由外國人管理生產槍炮彈藥。1865 年已經升任兩江總督的李鴻章又將洋炮局的主要工作人員遷往南京，合併滬、蘇一帶的兵工廠成立了「金陵機器製造局」，除了生產子彈和炮彈，還仿製當時歐洲最先進的後膛炮和機關炮等。

(參考編號：A12.A.32.3)



吳淞鐵路通車，1876 年。

桑德斯攝

相片所示是在中國修築的第一條鐵路，吳淞鐵路通車時在滬外國僑民試乘的情景。原本應該裝煤的車廂也站滿了人，後面還掛載了至少六節車廂。不過吳淞鐵路的運營只維持了年餘，清政府因為這條鐵路的修建沒有獲得批准而將其收購，隨後將其拆除。

(參考編號：1202-SHA67.A.5)



試航中的「德爾塔」炮艦，1876 年。

1875 年，正在籌建北洋水師的李鴻章接受大清總稅務司赫德的建議，從英國訂購兩艘當時稱為「倫道爾」艇的小型炮艇，排水量小卻配有一門口徑很大的火炮，1876 年交付予中國。這兩艘船在英國船廠臨時命名為「阿爾法」和「德爾塔」，經中方接收後，由李鴻章命名為「龍驤」號和「虎威」號。照片所示為尚在英國試航的「德爾塔」號。

(參考編號：1494-LC267.S.1)



在 1867 年法國巴黎世博會亮相的中國女性，1867 年。  
巴黎博濤照相館

第一屆世博會於 1851 年在倫敦舉行，直至 1876 年美國費城世博會前，中國官方雖無參展，但那時世博會已有中國人的身影，亦有中國商人及民間參與，展出中國商品。好像 1867 年法國巴黎舉行第四屆世博會，清政府婉拒了法國的邀請而無參展，但有一位法國漢學家德理文自動請纓承擔中國館的籌備工作，並委託在大清海關工作的法國人美理登組織了包括三名茶女在內的民間代表團參加，於場館開設了一家臨時的茶館，在巴黎引起了轟動。相片裡的兩位婦女即為當時來自福建，表演茶藝的茶女，此為她們盛裝在巴黎影樓的留影。

(參考編號：343-CDV.S.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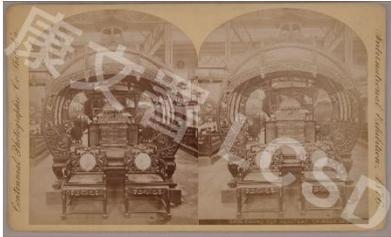
1876 年美國費城世博會中國展區，1876 年。  
美國百年攝影公司

1876 年，清政府首次派出中國官員出席美國費城世博會，參展商品共裝了 720 箱。

相片所示為中國展區，木質大牌樓上書有「大清國」三字。展區的佈置極具中國特色，展櫃亦仿廟宇式的建築，展示來自各省的物品，包括綢緞、象牙雕刻、瓷器、漆器、茶葉等。

是次世博會期間，正在美國留學的百多名中國幼童也在老師的帶領下到場參觀，並與中國官員李圭進行了交談。

(參考編號：SC8.7.1)



1876 年美國費城世博會中國展區，1876 年。  
美國百年攝影公司

相片所示有圓拱頂的月床是中國展區極受讚賞的展品之一，於寧波生產，上附大量精美雕刻，並鑲嵌象牙。此床在世博期間已售出，現為美國迪美博物館藏品。

(參考編號：SC8.6.1)



1878 年法國巴黎世博會中國館，1878 年。  
圖廷攝

1878 年的法國世博會，中國官方也有參展。相較於 1876 年的美國費城世博會，這次中國自建了獨立的展館，不再與其他國家共用一展廳。相片所示為當時的中國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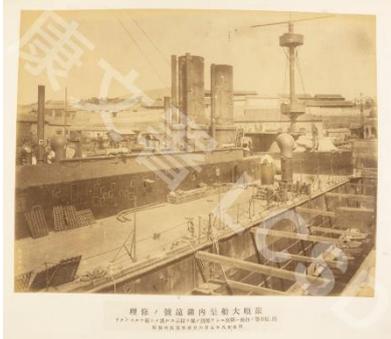
(參考編號：MC4.3)



1878 年法國巴黎世博會中國館，1878 年。  
圖廷攝

相片所示為中國館內的陳設，裝潢極具中國色彩，陳列的物品琳琅滿目，有瓷器、琺瑯器及宮燈等。館內亦設有販賣所，貨品以瓷器、茶葉、古銅器、雕刻、象牙折扇為多。

(參考編號：MC4.11)



停靠在旅順港船塢內的「鎮遠」號，1895 年。  
日本從軍寫真班攝

「鎮遠」號鐵甲艦是北洋水師兩艘主力戰艦之一，1880 年向德國訂製，1885 年交付中國，是當時亞洲第一的戰艦。

1894 年，日本藉口朝鮮問題，向中國挑起戰爭，史稱「甲午戰爭」。「鎮遠」號在甲午戰爭中曾擊傷日本艦隊旗艦「松島」號，迫使其退出戰鬥。但是在 1894 年 11 月 14 日進港時，「鎮遠」號船身多處擦傷，管帶林泰曾引咎自殺。之後日軍將「鎮遠」擄去編入其艦隊。

照片中的「鎮遠」被日軍拖至旅順船塢，正準備修理，船身上用粉筆標註出來的位置是被彈片擊中需要修理的地方。

(參考編號：984.12)



停靠在旅順港船塢內的「鎮遠」號，1895年。  
日本從軍寫真班攝

照片所示是停靠在旅順港內的「鎮遠」號鐵甲艦，其船頭設有尖銳而強壯的撞角。19世紀是重視撞擊的海軍戰術年代，這樣的設計代表著一流的戰鬥力。在船首兩側靠近船舷處，有代表中國的雙龍圖案。「鎮遠」號在艦首、艦尾及兩舷皆設炮。對比側舷站著的兩個人可知這艘鐵甲艦的體量有多大。

(參考編號：984.13)



自沉的「定遠」號，1895年。  
日本從軍寫真班攝

「定遠」號是北洋水師的旗艦，由清廷向德國訂造，當時被譽為「遍地球第一等之鐵甲艦」，威力冠絕東亞。此艦在1886年曾停泊於日本長崎進行保養，日本人目睹後亦被之震懾。然而，在甲午戰爭中，「定遠」號被日軍魚雷艦擊傷，後又擱淺，管帶劉步蟾下令炸毀「定遠」後自殺。照片顯示的是已被破壞擱淺的「定遠」號。

(參考編號：984.40)



旅順魚雷倉庫內景，1895年。  
日本從軍寫真班攝

清政府從德國訂製「定遠」號、「鎮遠」號兩艘鐵甲艦的同時，還從德國買回了當時最先進型號的魚雷艇，每艦配兩艘。魚雷頭部平時與雷身分開儲存，待裝艦時才會組裝。

(參考編號：984.10)



劉公島海軍公所，1895 年。

劉公島位於威海衛海灣，扼守海口，位置險要。在北洋水師成軍後，清政府將水師的指揮部，即海軍公所設置在劉公島上。但是在甲午戰爭中，日軍從陸路奪取了威海衛的岸上炮台，最終佔領了劉公島。

(參考編號：983.A.10)



丁汝昌花園遺蹟，1895 年。

隨著海軍公所設在劉公島上，北洋水師提督丁汝昌也帶著家眷把家安在島上，位置在公所不遠的一處山坡上。這處居所有花園、水池、假山，水池兩側各建一座亭。這些景觀在威海衛失守後都遭到日軍的破壞，正如照片裡的那樣：池中的假山已被推倒，一片荒草漫漫。

(參考編號：983.A.14)



被日軍破壞的炮台，1895 年。

日本從軍寫真班攝

威海衛的港口有劉公島扼守，但最大的弱點就在港口後邊的岸上，控制了岸上的制高點就控制了全港，因此清軍在附近的山上修築了多座炮台，並從德國引進了新式的岸防炮。諷刺的是，日軍攻打威海衛的戰略就是控制陸路，佔領岸防炮台，對大部分火炮進行了破壞，一如照片中的炮台那樣，將剩餘的火炮對準港灣中的北洋水師軍艦，進行轟擊，使北洋艦隊陷於日軍海陸的包圍。

清政府於甲午戰爭中失利，被迫與日本於 1895 年簽訂《馬關條約》。此為中國被迫與日本簽訂的第一個不平等條約，就中國的割地面積與賠款數量，大大超出了以前清政府與其他國家所簽的任何一個不平等條約，日本由此獲得巨大利益，令其進一步侵華的野心更為膨脹。

(參考編號：984.32)



李鴻章等人在俄羅斯，1896 年。

1896 年，為慶祝俄國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清政府派出以李鴻章為首的外交使團參加典禮。使團在俄羅斯停留了一個多月後，又前往德國、荷蘭、比利時、法國、英國、美國及加拿大遊歷，約半年才回國。那年，李鴻章已 74 歲，西方報章稱李鴻章帶了一口棺材隨行，以備萬一。這張照片是使團在莫斯科期間的合影，坐者是李鴻章，他右邊是他的嗣子李經方，左邊是他的兒子李經述。

(參考編號：943-MS31.1)



李鴻章肖像，1896 年。

巴黎夏洛特照相館

1896 年，李鴻章一行完成俄國的外交任務後前往歐洲遊歷，這張照片是李鴻章在法國拍攝。如果仔細觀看，他的左眼要比右眼小，原因是 1895 年他代表清政府赴日進行《馬關條約》談判期間，在街頭被日本人小山豐太郎開槍擊傷左臉。雖然這一槍沒有危及李鴻章的性命，但有彈片太靠近眼睛而無法取出，對李鴻章眼睛的外觀產生了一些影響。

(參考編號：MC7.1.1)



煙台的外國傳教士，1890 年代。

天主教在向中國的傳播過程中發生過不止一次文化和習俗上的衝突，明代(1368-1644)的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為打破傳教的障礙，主動改易中國人的服裝，並接近知識份子羣體，進而取得了重大的進展。正如照片中所示，這些在煙台生活的傳教士也是穿著傳統的中國服飾裝扮，男子甚至還蓄髮留辮。

(參考編號：AC25.A.1)



被燒毀的東交民巷使館區，1900 年。

普萊桑特攝

自不平等的《北京條約》規定外國人可以在北京久居之後，東交民巷就逐漸形成了外國人的聚居區，這裡不僅集中了多國的使館，還有很多為外國人服務的設施，如百貨公司、餐廳、

醫院、俱樂部等等，在庚子事變中這裡成為義和團重點進攻的對象。義和團是中國被列強不斷壓迫，以及民眾與教會衝突頻生背景下而發展起來，以「滅洋」為口號的組織。

當東交民巷區域被攻擊時，使館的外交人員都躲進了英國使館，其他大部分國家的使館建築被燒毀，從這張於熱氣球上俯拍的照片看，就一目了然。

(參考編號：GC11.A.3.1)



北京翰林院敬一亭，1900年。  
凱利牧師攝

清末翰林院與英國使館僅一牆之隔。1900年，義和團將火種拋入翰林院內，試圖引發大火讓其蔓延到英國領事館。使館內的外國人及時發現並撲滅了這場大火，但這樣的災難仍然導致保存在翰林院的數百冊《永樂大典》的唯一副本幾乎喪失殆盡。

(參考編號：AC37.14)



逃離天津，1900年。  
利卡爾頓攝

因應義和團仇洋反教的運動，以及慈禧太后於1900年6月以光緒帝的名義向列強宣戰，英、美、法、德、日、俄、意、奧八國組成聯軍，入侵中國。

天津的清軍對八國聯軍的入侵進行了堅決的抵抗，戰事蔓延，引起居民的恐慌，富商們紛紛逃離。照片中乘坐轎子是正在逃離這座城市的人，據攝影師利卡爾頓觀察坐轎者極可能是位大人物，走在前面的僕役還舉著白旗。

(參考編號：1133.S.11.1)



天津逃難的教民，1900 年。

利卡爾頓攝

義和團的主要攻擊目標除了外國人，還有信教的教民。面對八國聯軍的圍攻，天津城內的義和團進一步加緊了對教民的迫害，因此很多人逃往租界區，從那裡乘船投奔他處。

(參考編號：SC5.49.1)



河流裡漂浮的屍體，天津，1900 年。

利卡爾頓攝

相片所示為八國聯軍攻陷天津後，在河裡漂浮的屍體。據攝影師的描述，每天都會有大量的屍體和殘肢漂向河的下游，多數都是被聯軍殘殺的百姓，也有被義和團殺害的教民。岸上的建築屬法租界，在激戰中已經被打得千瘡百孔。

(參考編號：SC6.S.4)



被八國聯軍佔領的天津，1900 年。

利卡爾頓攝

八國聯軍攻入天津後，天津被割分成不同的區域，由不同的國家管理，照片中可見天津城內火光四起，欲離開的民眾坐在地上，正等待法國士兵放行，據攝影師所述，民眾帶著金銀細軟逃難，他們的很多財物都被掠奪，他們不敢抗議，也無法抗議。

(參考編號：SC5.61.1)



被八國聯軍摧毀的天津，1900 年。

利卡爾頓攝

照片中的這條道路曾經是天津城的南北軸線，是這座城市最重要的道路之一。但經歷了戰爭的這條街道繁華不再，留下的只有斷壁殘垣和滿目瘡痍。遠處略高的建築是鼓樓，也是這座城市中心的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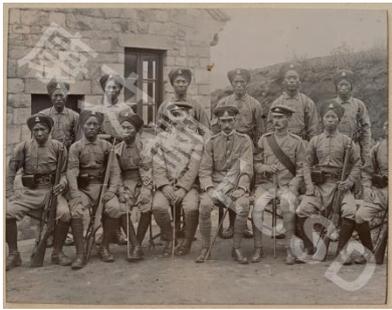
(參考編號：SC5.62.1)



俄軍拆毀民宅，1900 年。  
利卡爾頓攝

俄軍在佔領天津後，仍然以搜索義和團的名義在城中及周邊劫掠，並且野蠻地將居民的住所拆除甚至放火焚燒。

(參考編號：SC6.S.37)



威海衛中國人軍團，1900 年代。

英國在 1898 年強租威海衛後，在當地招募中國青年組建了威海衛中國人軍團，按照英國本土軍隊的標準裝備和訓練他們。除了中國人的面孔，他們軍裝上最大的特點就是印度式纏頭，並且在纏頭上別有一枚特製的徽章。

(參考編號：1131.64)



崇文門的鑰匙，1900 年。  
凱利牧師攝

照片中的這名美國士兵拿著開啟崇文門的鑰匙，長兩尺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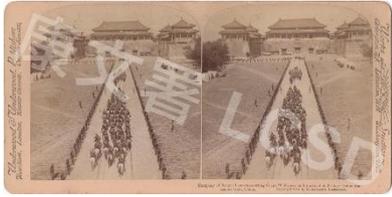
(參考編號：AC37.35)



日軍佔領的西華門，1900 年。

八國聯軍侵華時，各國在攻打北京城前，已商量好哪國攻打哪座城門，但各國實際上都各懷鬼胎，戰鬥開始的那天晚上，有的軍隊提前發起了攻擊，有的則臨時改變進攻目標，因此各國軍隊攻入北京城的時間也不一樣，開始搶劫的時間點也不一樣。列強為了達成從中國所獲利益的平衡，最後商定各國軍隊不進入紫禁城搶劫，並由美軍負責把守午門，日軍負責把守其他三座門。這張照片即日軍把守的西華門。

(參考編號：AC44.10)



瓦德西參觀紫禁城，1900 年。

利卡爾頓攝

儘管列強各國推舉德國元帥瓦德西為聯軍統帥，但實際上直到八國聯軍佔領了北京城之後瓦德西才姍姍來京。在歡迎儀式結束後，瓦德西在聯軍各國主要軍官的陪同下參觀了紫禁城，照片所示是參觀的隊伍正通過午門前廣場。

(參考編號：1133.S.2.1)



荒蕪的紫禁城，1900 年。

利卡爾頓攝

八國聯軍佔領北京後，清皇室「西狩」導致紫禁城的內部第一次展現在世人面前，但是，第一次進入紫禁城的攝影師利卡爾頓卻非常失望，他在日記中寫道：「院子裡的野草長得非常茂盛，整個院子裡的草夠一羣山羊吃的了。金水河裡也沒有水了，灌木從牆上的縫隙中長出來。」

(參考編號：SC5.81.1)



李鴻章在天津寓所，1900 年。

利卡爾頓攝

拍攝此照時，八國聯軍已攻陷北京，慈禧太后與光緒帝亦逃出京城，原在廣州的李鴻章受命北上與聯軍談判，但他一路延宕，一方面他年事已高，另一方面也為了能觀望形勢，以獲得更多授權。回到天津後他接待了很多前來拜訪的外國人，這張照片是接見美國訪問團時拍攝的。

(參考編號：SC5.67.1)



不平等的《辛丑條約》談判現場，1901年。  
水津芳雄攝

有關《辛丑條約》的談判主要是在西班牙駐北京的使館內舉行，這兩張照片就是其中一次談判的現場。下圖的桌前右起為慶親王奕劻及全權大臣李鴻章。



(參考編號：上圖 1024.5 / 下圖 1024.6)



克林德坊，1903年。

1900年6月20日，德國駐京公使克林德在前往總理衙門的路上，於總理衙門所在的總布胡同口被清軍擊殺。八國聯軍佔領北京後，根據不平等的《辛丑條約》的規定，清政府在總布胡同口修建了一座紀念克林德的石坊。照片中一隊全副武裝的德軍官兵在剛落成的克林德坊前合影，炫耀武力。

克林德坊的落成被認為是中國人的國恥，直到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民國政府將這座石坊拆走，移至中央公園內，更名為「公理戰勝」坊。

(參考編號：905.9)



透過正陽橋牌樓看正陽門箭樓，1900年。

義和團在1900年放火焚燒前門大柵欄的老德記藥房，大火蔓延至周邊的商鋪。一時風起，火焰向北吹到正陽門箭樓上，也引燃這座明永樂年間(1403-1424)修築的城樓。

這張照片攝於八國聯軍佔領北京城後不久，前門大街兩邊的鋪戶凋敝，被燒毀的城樓和丟失的牌樓匾額更加重了這場家仇國難的悲劇氛圍。

(參考編號：905.20)



日本侵略軍正通過正陽橋牌樓，1937年。  
大阪每日新聞社

這張照片和上一張的拍攝角度、拍攝位置非常接近。相比之下，雖然正陽門箭樓和正陽橋牌樓的匾額已經修復，但卻有相類的氛圍：日本侵略軍正從這裡進城，開始了對北京長達八年的佔領。

(參考編號：1141.3)



正陽門城樓，1870年代。

正陽門城樓自明正統四年(1439)完工後，一直是北京城的門面。因為位於皇城的正前方，故又被稱為「前門」。作為北京內城的正門，其規模居北京各城門之首。

(參考編號：AC9.A.9)



被燒毀的正陽門城樓殘蹟，1901年。  
懷特攝

正陽門城樓在明代(1368-1644)落成後雖然遭受數次劫難，但都進行了重建，最後一次被毀是1900年八國聯軍入京後，幾名英軍下屬的印度士兵在正陽門城樓內燒火做飯時引燃了城樓。對比上一張同一角度同一位置拍攝的正陽門，城台上只剩下光禿禿的基座，甕城內本來熱鬧的攤販也都消失不見。

(參考編號：SC21.52)



重建後的正陽門城樓，1900年代。

正陽門城樓被英軍燒毀時正值八國聯軍佔領北京城期間，光緒皇帝和慈禧太后都還沒有返京，因此重建城樓的計劃直到1903年才提出。但當時工部保存的工程檔案已被毀，因此重建的城樓參考了崇文門的樣式。

(參考編號：905.1)



戰火後的西什庫教堂，1900 年代。

為了躲避義和團，北京的華人教民大都躲到了位於西安門內的西什庫教堂內。義和團和清軍將教堂團團圍住，不斷槍擊和炮擊，教堂內僅有約 40 名法國和意大利的士兵作抵抗。歷經月餘的圍攻與圍困，義和團和清軍始終沒能攻下這座教堂。從照片可見西什庫教堂的正立面遍佈彈痕，花窗被打壞了，屋頂的十字架也歪斜了。

(參考編號：1024.200)



重建後的西什庫教堂，1902 年。

不平等的《辛丑條約》簽訂後，天主教會用清政府的賠款對西什庫教堂進行了修復，不僅重建了門口的兩座碑亭，而教堂的正立面在維持原風格的基礎上除了重建，還將鐘樓從兩層改為三層，即這張照片中的樣子。

(參考編號：1047.12)



火車駛進北京城，1901 年。

八國聯軍佔領北京城後，決定建設正陽門車站。要將鐵路線延伸到前門，就要穿過城牆，於是英軍將崇文門甕城東西兩邊各拆掉一段城牆，形成兩個豁口方便施工的火車通行，就像這張照片裡的那樣，待車站和鐵路建設完成後，又將這兩個豁口改為券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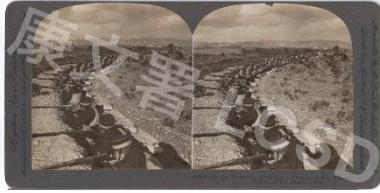
(參考編號：GC11.A.46.2.1)



前進中的俄國軍隊，1904 年。

日本及俄國為了爭奪在中國的利益，於 1904 至 1905 年在中國的土地上開戰，但清政府卻無力阻攔，只能默默旁觀。相片所示為一隊俄軍正沿著東清鐵路前往陣地。

(參考編號：1015.S.20)



在塹壕內準備衝鋒的日軍士兵，1904 年。

日俄戰爭期間，雙方在沙河附近準備展開爭奪瀋陽的戰役，這片地帶是非常開闊的平原，因此雙方都修建了大量的塹壕。經過兩週血腥的戰鬥，日軍獲得了勝利。

(參考編號：1015.S.28.1)



日軍在瀋陽，1905 年。

懷特攝

照片所示是旅順戰役前，日軍運送輜重的隊伍正通過瀋陽的鐘樓。

(參考編號：1135.S.33.1)



日軍炮擊守衛旅順港的俄軍，1905 年。

旅順是日俄戰爭中雙方的必爭之地，而控制旅順港的制高點是港口西北方向的 203 高地，為了奪取這一戰略要地，日本方面組建了專門的軍隊進攻。日軍最終攻下高地，繼而攻下旅順。這張照片是正在向旅順港內俄國軍艦傾瀉炮彈的日軍。

(參考編號：1015.S.14)



俄國戰俘在日本，1905 年。

懷特攝

為塑造「文明日本」的形象，日俄戰爭時，日本參照了國際法有關戰俘待遇的規定，而制定了相關的法規制度，例如根據俄國戰俘的軍階給予不同的糧食待遇。相片所示為當時的俄國戰俘。

(參考編號：1135.S.5.1)



正太鐵路通車，1907 年。

為了輸出山西的煤鐵等資源，1896 年山西巡撫胡聘之向清廷提出請求修建一條從太原到正定的鐵路，但有官民反對修建鐵路。這條鐵路最終在 1904 年才開工，1907 年竣工，這是通車時的石家莊站。

(參考編號：AC27.2)



修理火車頭的中國工人，1900 年代。

雖然正太鐵路是法國工程師負責測繪和設計的，但這條鐵路的修建也為中國培養了一批相關的技術人員。從這張照片中可以看出這樣的修理工作需要很多人同時參與，除了一名法國工程師外，其餘都是中國人。

(參考編號：AC27.13)



新軍軍官視察演習，1900 年代。

清政府在經歷甲午戰爭的失敗後決定編練新軍，由廣西按察使胡燏棻在天津馬廠成立了定武軍，其後交由袁世凱督練。袁世凱仿照德、日陸軍操典條令，對定武軍進行改編，並裝備歐洲的新式武器，定名為新建陸軍。用先進的制度和科學的方法訓練出的這支部隊有著舊式軍隊沒有的戰鬥力，進入民國後成為北洋軍隊的主力。照片所示是 1905 年軍事演習時的軍官。

(參考編號：905.108)



演習中的新軍士兵，1900 年代。

從這張照片中能看到新軍普通士兵的裝備：他們裝備的步槍是德國製的毛瑟步槍，身上的裝具也學習自德軍，背包上繞著卷起來的毛毯，上部掛著飯盒，背包兩邊還有一雙皮靴，腰帶上除了掛有彈藥包外，還掛著水壺，背包插著一把工兵鏟。值得注意的是他們的辮子，都盤起來塞在了帽子下邊。

(參考編號：905.86)



處置鼠疫，1911 年。

1910 年底，東北地區爆發鼠疫，其源頭是受僱於俄羅斯商人捕獲旱獭的中國獵人。最初人們不知道蔓延如此之快又非常致命的是什麼傳染病，中國聘請了陸軍軍醫學堂的副監督伍連德博士進行調查及防治工作。伍博士是馬來西亞出生的中國醫生，他根據病人的症狀和生活環境判斷出這種病毒是通過飛沫傳染，定名其為「肺鼠疫病毒」，並通過隔離治療的方法阻斷了疫情的進一步傳播，照片中有嚴密保護下的人員在現場處理疫情。

(參考編號：AC24.229)



臨時隔離病院，1911 年。

伍連德博士在確認東北鼠疫是依靠飛沫傳染的肺鼠疫病毒後，提出的策略主要就是檢疫、收治與隔離，徵用了一些學校、工廠廠房、火車車廂作為收治病患的臨時醫院和隔離病房，照片中是被徵用的濱江(今哈爾濱)官立女子兩等小學堂。

(參考編號：GC24.P.4)



病房，1911 年。

相片所示為醫護人員在巡視病房。

(參考編號：GC24.P.19)



醫院的女隔離房，1911 年。

這張照片顯示了女隔離房。病人所帶的口罩是由伍連德博士發明，其特點是在兩層紗布中間放置吸水藥棉，採用掛耳的方式遮擋住口鼻。這種口罩不僅可以有效防止飛沫傳染，而且製作方便，價格低廉，當時被稱為「伍氏口罩」。

(參考編號：GC24.P.17)



收治病患，1911 年。

照片中這座「養病院」很明顯是座臨時徵用的商舖，兩名役夫正用擔架抬著病患離開養病院，這兩個人看似嚴格遵守了防疫規定，不僅穿著專用的外套，而且也正確佩戴了口罩。

(參考編號：GC24.P.8)



光緒皇帝的出殯隊伍，1909 年。

1908 年 11 月 14 日，光緒皇帝駕崩。彼時他的陵寢還沒有建好，只能先送往清西陵暫厝。1909 年 3 月 12 日，舉行了聲勢浩大的出殯儀式。圍觀的百姓人山人海，但是從這張照片看，路另一側負責維持秩序的新軍都下跪了，但是路這邊的百姓卻有很多人沒有下跪，在下跪的人中還有半跪的，雖然這與我們瞭解的清代禮制有很大差別，但也確實反映出當時清政府中央集權的衰落。

(參考編號：AC24.5)



湖廣總督瑞澂與湖北新軍軍官合影，1900 年代。

在清廷關於編練新軍的號召下，湖廣總督張之洞將湖北境內的舊式軍隊改編為湖北常備軍。1907 年新軍軍制確定後，依新軍編制再行改編，分別由張彪和黎元洪統帥。

這張照片是瑞澂在湖廣總督任上與湖北新軍主要軍官的合影，前排右六是瑞澂，右七是他的兒子，右四是張彪，右三是黎元洪。

(參考編號：AC51.31)



臂纏白巾的起義軍，1911 年。

丁樂梅攝

1911 年 10 月 10 日的武昌起義為辛亥革命揭開序幕。當時並無起義軍的制服，他們相約臂纏白巾，以作識別，就如相片所示那樣。

(參考編號：1994-899.4)



鄂軍都督府，1911年。

武昌起義勝利，武昌起義黨人在原來的湖北省諮議局大樓成立鄂軍都督府(湖北軍政府)，推舉黎元洪為都督。照片中正是已經改換旗幟的鄂軍都督府大門。商販們已經開始在大門前擺設攤位，似乎恢復了正常的社會秩序。現在這裡已經成為辛亥革命博物院。

(參考編號：AC49.19)



北京街頭掛起五色旗，1912年。

辛亥革命成功後，民國肇建。1912年4月，臨時政府遷至北京，經臨時參議院表決，自上而下按紅、黃、藍、白、黑順序排列的五色旗被定為中華民國國旗。照片中北京的前門大街懸掛了中華民國的國旗。

(參考編號：1027.89)